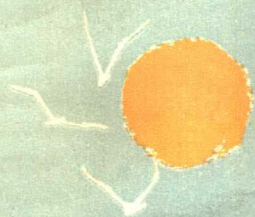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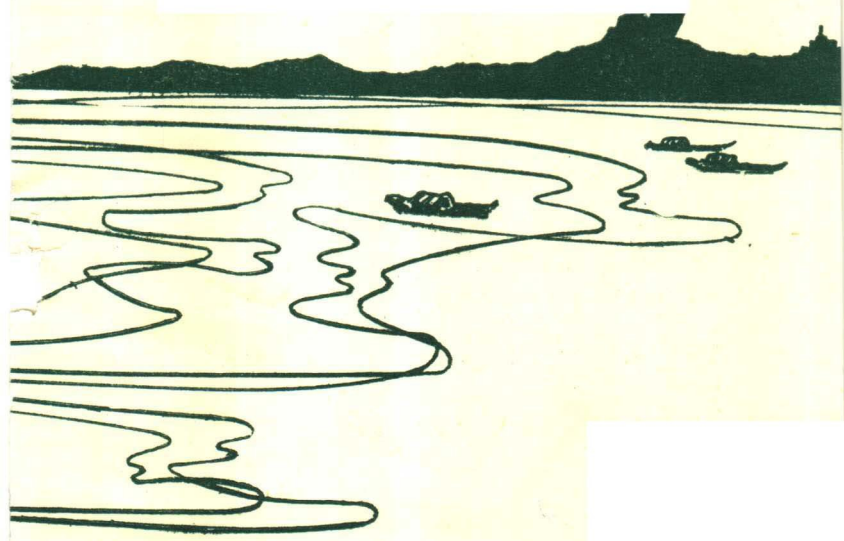
邱朝宗

海濱感舊集



44.62
202

集舊感濱海



本书收入作者1982年以来的新作35篇，分为5辑。记人物，知人明而品题公允深澈，待人诚则感情真挚深厚；作序跋，论世知人，洞鉴明达；谈学问，厚积薄发，金针度人；发议论，胸襟通达，气度洒脱；纪游历，捕捉印象于转瞬即逝之间，抒发情怀于景致流动之中。全书朴挚平易而又热情充溢，信手挥洒却能神韵俱出，虽为老人之感旧，却情意绵长，充满英气和活力。

郑朝宗，字海夫，1912年生。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，曾负笈剑桥，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。生平除从事中西文学研究外，小品散文已结集为《护花小集》、《梦痕录》。

目 录

是智者，也是仁人志士 1

——忆余老

与人为善，自强不息 8

——记王亚南校长

悼德基 12

怀王梦鸥先生 18

忆吴宓先生 22

忆温德先生 30

怀清录 35

——一个平凡人的一生

怀旧 45

续怀旧 58

《鲁迅杂感精华录》编后记 72

《林纾评传》序 84

- 90 赤胆贞心的最好见证
——读《战火中的书简》忆彭柏山同志
- 94 《李拓之选集》序
- 101 画龙点睛 恰到好处
——读《记钱钟书与〈围城〉》
- 107 读《干校六记》
- 111 笔记与文风
- 116 精读与博览
- 119 书声
- 123 《管锥编》作者的自白
- 127 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提供了什么？
——答《文艺学习》编者问
- 134 魂气留痕泣送春

天才的预见	137
——读莎剧《裘力斯·凯撒》	
人格与文德	145
说申公巫臣	148
说王善保家的	151
神圣的泪水	157
中美女排赛的启示	161
火	164
说“狂”与“妄”	167
说“骄”与“傲”	170
关于爱情和友谊的通信	173
海滨寻梦记	177
我徂东山	181
汀州杂忆	185
往事漫忆	191

是智者，也是仁人志士

——忆余老

人到晚年容易感旧，特别是在生病的时候。前些日子在家里养病，忽然想起了许多已经逝去的师友，其中之一便是余老。提起此老，我仿佛欠下了一笔早该归还的陈帐，心里着实负疚。他去世后不久，有人建议要我写篇纪念文章，我踌躇了几天，终于没有写成，因为我不知如何下笔。那时是个严峻的时期，写作路子非常狭窄。我和余老相处十几年，对他的人品学问略知一二，但对他的生平经历却颇生疏，因此即使要写峨冠博带式的大帽子文字，也是难以措词的。如今事隔三十年，文艺界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，余老的声音笑貌重新回到我的记忆里，俨然如在目前，我想趁这机会，把它记录下来，聊以了却我的夙愿吧。

余老名睿，字仲詹，江西南昌人。他来厦门大学文学系任教恰在鲁迅先生离去之后。1938年我在长汀初次见到他时，他才五十几岁，鬓发斑白，老态龙钟，看上去很象现在的七十许人。校里

同事都称他作“余老先生”，这不仅仅因为他年龄大，实际还带点尊敬之意。他容貌奇伟，很有威仪，谈吐举止，全合规范，总的说来，给人以庄严肃穆的印象。不认识他的人会以为这是个道学先生，一向都是如此讲究风度的。其实不然。据别人告语，萨本栋未来厦大以前，他是另一样子。那时他不带家眷，长期住在单身宿舍里，工作之余，常到附近房间去找青年教师闲话，每每谈笑风生，不拘形迹。他喜欢喝酒，酒量大得惊人。他又热爱民间戏曲，每星期必到厦门市去看戏。这哪象道学先生，分明是个脱略形骸的魏晋名士。萨本栋来了之后，经过短时期的观察，他告诉一位青年教师说：“这位新校长和前任校长不同，是个方正严肃的人，我们可要注意检束自己的言行。”果然，从此他改变了生活方式，学校迁到长汀后便把家眷接来，下了课就呆在家里，不再出去串门，有熟人来访，也不再随意戏谑。酒更是彻底戒绝，在宴会上只举杯做个样子。我在长汀看到的余老就是如此。当然，在骨子里他并不是一个道学先生，爱好生活和饶有风趣是他的天然本性，后来也未改变，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。一个人能随环境和年龄的变迁而调节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这说明他是有智慧的。余老是个智者，一切认识他的人都有此看法。

他的智慧不仅表现在处理人事方面，而且也突出地表现在课堂讲授方面。他是个杰出的教师，在校内堪称数一数二。这在老年人中是罕见的，有些老年教师学识渊博，而教学效果却一塌糊涂。余老在这方面显得特别聪明。他眼光敏锐，对学生的情况十分了解，因而能对症下药，因材施教，决不盲目地夸奇炫博，高谈阔论，白花力气。他口才极好，又善于措词，讲起书来，从容不迫，使每一句话都落入听者心中。此外，他还能从戏曲表演中吸取一些有用的东西，如声调、眼神、手势等等，以弥补言语之所不及。这些合起来，使他的教学效果压倒群伦。听过他讲授的人用“深入浅出，雅俗共赏”八个字作为评语，这是恰当的，因为他的确能使各种不同程度的人都有所得，个个满意。尤其可贵的，象“文字学”之类比较枯燥的课程，他教起来也不吃力，也能令听者觉得有趣。

余老二十几岁中了举人，在故乡名噪一时，被称为“才子”。后来在严复当校长的时期进入北京大学（当时叫做“京师大学堂”），大概也是学生中爱闹风潮的一个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闹风潮的事；学生们不知因什么事对学校不满而起哄，别的老爷们弹压无效，最后只好请校长出来讲话，严复威风凛凛地登上了讲台，把头上戴的皮帽往桌子上一掼，那风度真是美极了！余老是最善于描摹

的，严复攒帽子的样子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子里。但他对严复的学问文章可是由衷敬佩的，一卷《天演论》不知读了多少遍。他自己早年似乎也有埋头著书成一家之言的志愿，但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从没见他认真地在写些什么。我曾问他：“您学殖丰富，又善属文，为什么不留下一点东西给后代的人？”他微笑着说：“有太炎先生和季刚（黄侃）他们的著作在前头，我还写些什么呢？”这是谦逊之言，但也是智慧的一种表现。到了晚年，他看到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极限，因而不勉强去做他认为别人做得比他更出色的事，而把全副力量用在他的特长（教学）方面，这种态度我认为是可取的。

话虽如此，我总觉得有点遗憾。余老在声音文字之学方面的成就有多大我虽不得而知，但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却是我常领教过的。他可算得一个了不起的文学批评家，对唐宋诗词中的名作能明辨高低，这且不说，最难得的，一篇看来普普通通的作品，经他老眼一照，也能洞察其中的妙处，并用最有说服力的语言仔细分析，道出其所以然来，使你感到切理赅心，不得不佩服他的高见。我曾多次听过这样引人入胜的评析，可惜没把它记录下来，而他自己也是说过就算，不曾用对话录或随笔的形式加以保存，咳唾珠玉，随风飘散，如今连影子都没有了！

和其他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学者一样，余老最肯诱掖后进。他从来不拒绝上门求教的人，而总是耐心地解答一切。他自谦文采不足，很少拿自己的作品示人，但对别人的创作，倘其中真有些精彩之处，便大加称赞，有时还锦上添花，替你润色。可是，他也不随便讨人欢喜，我曾眼见有人沾沾自喜地拿诗稿请他“教正”，他看过之后说几句客套话，然后用严肃的口气委婉地指出其中有待推敲的地方，在这个场合，他表现了“和而不同”的儒者态度。余老热诚对待一切人，对于无故冒犯他的人也能处之泰然。他主持文学系多年，有一时期校里来了两位青年教师，他们以新派自居，背后对余老有些议论，余老听了不置可否。他自己从不轻议别人，偶然谈及，也总是带着善意。他不认识鲁迅先生，但对鲁迅的为人很感兴趣。他说鲁迅善作青白眼，惯以青眼对待朋友，而以白眼对待自己所不喜欢的人。有一次学校总务处长来看他，他躺在床上不动，眼睛望着帐顶，总务处长恭恭敬敬地站在床边问话，他除了几声“嗯，嗯”之外，不予答理，总务处长看到的始终只是他的眼白。这故事自然是听来的，但经他的梨花妙舌一描摹，仿佛是来自亲眼目击。在我所见的鲁迅轶事中，这一则似乎还未被收入记载。

余老教书几十年，足迹不出校园，但对国家大

事并不冷漠。抗战时期，他在长汀组织了一个诗钟会，每星期举行一次。“诗钟”别称“折枝吟”，是福建文人最爱玩的一种文字游戏，只有十四字。这种玩艺儿一般只用以消磨时间，无甚意义，但做得好的也能在其中抒发情志。余老就是这样。他的诗钟句子多已散失，只记得一次做的是嵌字格“龙”、“大”第六唱，余老做了几十联，其中有两联云：“孤臣有泪持龙节，降将何心抚大刀”；“细调鱼子为龙醢，漫煮瓠瓜作大烹。”那时是抗战后期，国民党军队一蹶不振，有些士卒孤军苦战，有些将领颺颜投敌，第一联说的就是此事；上句用的是苏武的典，下句用的是李陵的典，珠联璧合，十分工巧。那时政治腐败，物价飞腾，人民生活极其艰苦，第二联说的就是此事；作者采取谐谑手法讽刺时政，效果加倍显著。抗战胜利后，厦大从长汀迁回鹭岛，诗钟会继续举行了一个时期。由于内战爆发，狐鼠横行，国统区的景况比从前更惨，有一次做“大”、“元”第七唱，出现了“计拙米盐怜措大，魂惊汤火痛黎元”这样的诗句，余老把它高高地取了第一名。但是，不久他就宣布解散诗钟会，洗手不干这种文字游戏了。原来他已另打主意，用实际行动去支援解放战争，促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早日灭亡。在进步学生的帮助下，他开始阅读解放区出版的书籍，同时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暗暗为革

命服务。一天，国民党特务来校抓人，有一个地下党员被追捕甚急，正在危险关头，有人把他带到余老家里，余老让他躲在一间空房里过了一夜，翌日他终于脱险了。一九四九年暑假前，厦门面临解放，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暑假，进步学生为了护校坚决不同意。在一次讨论此事的教授会上，有些人赞成，有些人反对，余老三次起立声色俱厉地力争不宜提前放假，使不明真相的人大吃一惊，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位老人如此顽强地坚持己见。余老从一个清静恬退、思不出位的学者，一跃而成为敢于冒大险、伸大义的革命者，这固然主要是时代环境使然，但他本身所固有的热爱祖国、热爱正义的良好素质，无疑也起了一些作用。他不仅是一个智者，实际上也是志士仁人。

解放初期，余老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。他曾经积极参加政治活动，由于体力不支，很快就病倒了。1953年春天，他不幸逝世。他生前无赫赫之名，死后不久又逐渐默默无闻，但我相信他的影响会永存在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心里，并且通过他们而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，如同过去千千万万的智者和志士仁人，他们生前发出的光和热永存人间，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一定都挂在人们的口上。

1982年5月17日

与人为善 自强不息

——记王亚南校长

今年是厦门大学建校六十周年，人们饮水思源，对过去有功于这个学校的先辈们，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予颂扬，其中常被提起的，有陈嘉庚、萨本栋、王亚南三位。陈老出于爱国热情，毁家兴学，一生为创办和充实厦门大学耗尽了心血，功居第一，理所当然。萨先生在危难之际奉命接办厦大，随后又搬迁到山城长汀，六七年间，艰苦支撑，使学校不仅没有解散，实际反得到发展，这功德也着实不浅。王先生在新中国充当厦大首任校长，开头几年，全力以赴，成绩斐然，人们至今记忆犹新。但他毕竟是在顺利的环境中，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建立功业的，对厦大的贡献，比起先前二位略逊一筹，所以只好屈居第三。这种妄评是否公允，大家可以讨论。

可是，我写此文的目的，主要还不是为王先生评功，而是想借此机会宣扬他身上极其珍贵的品质。王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者，关于他的学术成

就，论者已多，无须外行人置喙。关于他的为人，也已有许多文章从各方面加以表彰，这里不拟重复。我认为针对目前情况，我们应该认真向他学习的，就是本文题目上指出的“与人为善”和“自强不息”这两大品质。

王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同时也是人道主义者，这两者原是统一的，在他身上结合得尤其完美。他很早就以思想进步著称，但据我所知，无论在解放前或解放后，他从没对后进的人露骄矜之态，更不会摆出一副“进步脸”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他诲人不倦，有什么问题请教他，总是热情地详加解答。他当然坚持他所深信的真理，但对别人的不同见解也不一概抹杀。在这方面，他很讲情理，决不蛮横武断。解放后，他竭诚拥护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，毫不动摇地执行上级的一切决定，但对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动，并不盲目赞同。他心胸仁慈，即使对他所不喜欢的人，也不忍心加以无情打击。他十分爱才，不管同辈后辈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总是人前人后夸奖不置。当然，他最注意诱掖的是青年中佼佼者，经他提携而成为一代名人的，不止一两个。他自己也因此而受到普遍的称赞。总之，与人为善是他的第一美德，这种品德历来可贵，而今天尤其难得。长期混乱、残酷的世局，使人我之间如隔万重山，互相猜疑，互相嫉妒，互相倾轧，竟

成为一时的风尚，至今尚未消除净尽。面对着这种情况，一切有心人怎能不对祖国前途抱着无穷的忧戚呢？要挽回这一颓风，除了坚持党的安定团结的方针之外，还需要有一些身居显要，众望所归的一，特别是一代宗师，出来以身作则地树立胸怀广阔的榜样，以诚感人，以德诲人，像王先生那样。否则风气是很难扭转的。

王先生是一辈子手不释卷的学人。解放前，他的时间主要用在研究学问上面。他的书房里堆满了经济学原著，他每天在那里孜孜矻矻，乐不知疲，只有午后才出来散散步。解放后，他当了校长，事情忙是可想而知的，但并不因此而废书不读，每天还想方设法挤出一定时间用以治学。这种苦干的精神和萨先生很相似，他们二人都是自强不息的典型。王先生为人乐观，即使在旧社会黑暗的日子里，也从没见他愁眉苦脸，灰心丧气。他很爱笑，笑声是爽朗的。研究经济问题之余，他也爱看外国小说，谈起故事情节来，娓娓动听，逸兴横飞。这是精力充沛的表现，大约跟他所钟爱的狄更斯一样，他的精力要比别人多一二倍。这样的人目前是多么需要啊，然而放眼一看，却不免令人担心。有些人未老先衰，年方而立，似乎已到该退休的时候了，浑身没有半点劲。还有些人终日昏昏沉沉，悠悠忽忽，不知干些什么。更严重的，有些人